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 和统战策略的变动

杨奎松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最彻底的苏维埃革命,停止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甚至不得不佩用上国民党军队的军装帽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①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并接受蒋介石的“指挥”。^②这毫无疑问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结果。^③始终重视阶级斗争并对国民党保持高度警觉的毛泽东,仍旧不能不把与国民党长期合作,承认“国民党居于领导的与基干”的地位,和将来建立一个“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作为党的路线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下来。^④

但是,国内外形势和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发生改变。就在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刚刚决

① 1936年,中共北方局最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承认国民党“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即在《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表示同意国民党人在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在1937年的国共两党正式谈判中,中共中央正式确定“承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见:《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洛甫、毛泽东二同志致朱、张、徐等同志电》,1936年10月11日,《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16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289,429—430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③ 中共在最初提出统一战线时也曾经一再主张以苏维埃为中心和以共产党为领导,但这样的努力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显然没有可能。中共在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正式成立时的实际兵力只有5万人左右了,而国民党的兵力却有150万人以上。

④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

定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路线不久，随着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发生，毛泽东开始全面修正前此的统一战线政策了。

一 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初步改变

毛泽东对国民党态度的初步改变，明显地起因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1938年中共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度积极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国共关系，以至进一步实现组织上的密切合作。但随着武汉陷落，日军大举进攻暂告停顿，以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共放弃对军队政权之控制和地盘之割据^①为肇端，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至12月中旬，蒋介石不仅拒绝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密切两党组织上合作的建议^②，而且第一次明确告诉中共代表：将中共合并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共产党做多少让步也不行。^③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诸如两党磨擦之类的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④随后，国民党开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方针。蒋不仅下令禁止八路军跨越战区，纵容和鼓励河北等地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与八路军磨擦，逼迫八路军退出河北等地^⑤，而且在1939年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

① 转见《中央日报》，1938年12月25日。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

③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谈判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83—184页。

④ 《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及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9年1月21日，同上，第192—193页。

⑤ 见《朱、杨、左、傅关于国共磨擦日渐增加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90页。

的秘密文件^①，从而使得国共两党之间矛盾和冲突渐渐白热化起来。共产党利用敌后空虚全力发展，不仅从抗战开始时的陕北一隅迅速发展整个华北地区，而且其军队从抗战之初的 5 万余人迅速扩充到 20 万人之多，这种情况使国民党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②，再不加紧抑制，抗战胜利后自己必将失去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蒋介石相信，只要“上层注重‘理性的折服’”，“中下层予以事实上之‘打击’”^③，国民党就能够抑制共产党势力的进一步蔓延。

蒋介石突如其来的“限共”、“反共”行动，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震动。毛泽东怀疑蒋介石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妥协阴谋。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估计利用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能^④，但面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的突然加剧，他开始作最坏的设想，相信蒋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赖英美，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由于慕尼黑协定出笼，英法在欧洲的妥协政策打破了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毛泽东认为已经失去了建立世界性和平阵线的任何可能，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也会日趋严重，国民党内反共势力公然抬头或许就是其妥协倾向恶性发展的一种反映。当中共获得国民党计划依靠英美的压力促成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情报时，毛泽东甚至怀疑：蒋介石可能想要造成“东方慕尼黑会议”，“依赖英法”，“把日本迫到卢

① 国民党这一阶段先后制定和颁发的秘密“限共”文件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 年 4 月）；《共党问题处置之办法》（1939 年 6 月）；《处理异党实施办法》（1939 年 11 月）等，参阅《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8 册，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1 年印刷，第 318—333 页。

② 《八路军在华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1939 年，同上，第 35 页。

③ 《共党问题处置之办法》，同上，第 321 页。另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 3 辑所录《陈诚致徐永昌函附办法》（1939 年 6 月 26 日）和《徐永昌复陈诚函附修正办法》（1939 年 6 月 28 日）两件可知，此一秘密文件是 6 月以后下发的。

④ 毛泽东：《论新阶段》。

沟桥去”，并以割让东北和内蒙作为交换。^①

不过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共产党显然并没有改变自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抗日的积极评价。鉴于汪精卫叛变投降，蒋介石没有步其后尘，而且公开拒绝了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毛泽东依然肯定国民党在总的发展方向上还是“在进步”，只是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整个进步中有部分的退步”。因此，他仍旧主张对国民党“要亲爱，要团结”。与前不同的是，毛泽东开始强调在统一战线原则中，还要加上“反磨擦这一条”，要加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主张，“他占我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捉二个，我们捉他四个”，用加倍的惩罚打击那些国民党反共势力，用发展进步势力的办法来造成“压服”退步逆流的实力。^②很显然，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态度虽然仍旧是“和为贵”、“亲爱团结”^③，但他认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必须坚持斗争和合作两个方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面对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措施和蒋介石一心想吃掉共产党的野心，如果不全力反抗和斗争，结果不仅合作不能保持，最后恐怕连共产党也要被消灭掉。

尽管人们开始把慕尼黑协定出笼后国际形势中出现的一些不利情况与国民党政治态度的变化联系了起来，但国际形势的变动似乎还并不是十分糟糕，而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停止争取世界上三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与社会主义苏联团结合作的努力^④，因此，毛泽东也同样希望英美等国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矛

① 参阅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4月2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以下仅列篇名者同此。

② 毛泽东：《对十八集团军延安总站检查工作总结会议时之演说》，1939年1月28日。

③ 同上。

④ 参见《欧美十六国共产党号召实际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宣言》，1939年1月27日，《解放》，第66期，1939年3月20日。

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①当1939年3—4月西班牙受德意支持的佛朗哥政权在内战中获胜,捷克斯洛伐克与阿尔巴尼亚先后被德意吞并,英法两国政府被迫开始放弃绥靖政策,整军备战,并试图与苏联进行有关集体安全问题的谈判,这些情况再度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受到鼓舞,他甚至开始相信国际反侵略阵线“现在有其前途了”。^②但是,这种乐观的估计几乎立刻不得不改变了。这是因为,在1939年3月18日,斯大林已经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它已经准备放弃集体安全的努力,决心置身于所谓帝国主义战争之外,并开始把防备英法等所谓“民主国家”的渔人政策作为自己头等重要的外交目的了。^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只是在斯大林讲话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了解到其讲话的具体内容的。^④但是,5月30日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更清楚地显示出这种政策的转换和它所带来的影响。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指出:(一)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一种新的慕尼黑协定的必然反映,其中包含着重大阴谋;(二)中共应当全力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要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反共阴谋,因为反共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三)党的基本任务,仍是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在开展反对妥协投降,揭穿反共即投降准备的同时,应注意不给统一战线的破裂造成任何借口。^⑤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形势估计,对于中共对国民党及英美帝国主义的認識发生了影响。在1939年6月以后,毛泽东前此对国

① 毛泽东:《对十八集团军延安总站检查工作总结会议时之演说》。

② 毛泽东:《在抗大检讨工作总结晚会上演讲词》。

③ 参阅《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215—220页。

④ 中共中央了解到斯大林3月18日讲话的具体内容至少晚了两个月以上。5月1日其机关刊物《解放》发表专门声明解释未能刊登斯大林讲话的原因,是因为未能得到讲话全文。后又隔了将近两个月,即6月25日,《解放》才正式刊出斯大林讲话的全文。

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5月30日。

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全力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对英美等民主国家及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直截了当地谴责帝国主义的反共反苏的阶级本性^①;他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强调国民党“光明前途”的方针^②改变了,开始明确肯定“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主张要对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当然,毛泽东并非希望国民党真的投降,他还是要争取国民党大多数坚持抗战,因此,在策略上,他仍旧主张不放弃“拥蒋”口号,主张“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③

二 革命目标的提出与策略转变的完成

共产国际的指示显然使毛泽东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的局面。但是,什么时候才是“战争与革命”的局面呢?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紧接着,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毛泽东看来,这当然就是“战争与革命”的局面。毛泽东明确认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之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以便“推翻世界反动营

①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并见毛泽东:《论新阶段》。

③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

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①共产党人相信,根据以往革命的经验,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预言,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后,必将伴随着更广泛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诞生。

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提防国民党叛变投降之日起,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重新认识国民党了。国民党“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②的作法,以至不惜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并挑起冲突,更激起他对国民党的极端不满。^③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与革命”的局面的到来,自然促使他开始从阶级的角度重新评价国民党的作用了。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公开抨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认定它“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④,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发展,看作是不利于他们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与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即拿这个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的”。^⑤毛泽东断言: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⑥这其实也就是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绝不能“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不仅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领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

②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③ 毛泽东在1939年7月的一次号召保卫边区的讲演中即断言:“我们中国,如果再在这些襁褓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毛泽东:《保卫边区——你们是第一责任》。

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

⑤ 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第1期,1939年10月4日。

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5日。

导责任也“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①而今后革命的发展方向,也绝不可能是“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地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它只能是“变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②

毛泽东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内部,对日本侵略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共产党对它们也应该有不同的政策,不能一概的排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开始时仍旧沿袭中共前此的分析方法,认为抗日的国民党主要反映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不过认为国民党的一部分反映着“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一部分”,而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统治者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反映着大地主的利益,因而“是妥协性很大很不可靠的部分”。^③但是,按照这种区分方法,蒋介石集团不属于“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新的策略方针。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在1940年7月以后“才正确认识清楚”如何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④事实也确是如此。当1940年3月毛泽东开始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以及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设想^⑤时,他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25日。这里没有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字,而是引用了当初发表时的文字,因为《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字是根据毛泽东后来的认识和需要而修改过的。这一时期有关的文章,如《新民主主义论》和《(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也是如此,笔者也都尽量引用最初发表时的文字。

④ 见《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40年12月4日。

⑤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740—741页。

已经认定：“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故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①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应当争取作为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② 到1940年9月6日，毛泽东终于明确提出了“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重要观点，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他们是现时的主要当权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的部分，即过去所说的“中等资产阶级”。^③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从理论上完成了他对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即不仅确定了新的革命目标——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确定了联合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也确定了孤立和打击的对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

三 变化的形势与困难的决定

当毛泽东把蒋介石国民党当权派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把大资产阶级等同于买办阶级之后，他更加重视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动向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还在1940年6月法国战败以前，毛泽东就断定蒋介石发动反共磨擦有国际背景，认为这是“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对日妥协”，“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组织英美法日华五国的反苏反共集团”。^④ 法国战败后，考虑到英法已经失去了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

①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讨论目前时局问题的结论》，1940年7月13日。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关于对地主资产阶级军官进行调查致恩来电》，1940年9月6日；《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55—357页。

④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1940年6月。

性,蒋介石失去了组织反苏反共集团的帝国主义支持,因而他断定“发动反苏暗流与反共高潮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要被迫着重新来考虑其政策”了^①,他们有可能“在不妨碍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②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后,中共分析蒋介石是否会离开英美集团加入德意日集团,抑或加入英美集团去反对德意日。毛泽东担心,一旦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必使“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而日本若投降美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国共两党必“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将占尽优势,“最黑暗莫过如此”了。^③他并判断,由于中共已经发展到50万军队、60万党员,而“大资产阶级不统一不强大”,国民党内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也竭力反抗,蒋介石将不得不“被迫让步”,一方面承认共产党在黄河以北的实力地位^④,一方面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有实施宪政的必要。于是毛泽东很快决定,不仅要迫使这种初步好转得以实现,而且“还要争取彻底好转,即大资产阶级下台,代以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得一票”。^⑤

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靠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存在的,这是毛泽东在英法两国失去东顾能力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然而,国民党7月16日《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扫数”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八路军编六个师,新四军编两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1940年6月。

② 毛泽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1940年7月6日。

③ 《毛泽东关于形势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问题致周恩来电》,1940年10月25日。

④ 由于在1939年开始的恢复管辖权力的“限共”行动不能约束华北地区共产党的八路军,1940年4月16日白崇禧上书蒋介石,主张用划界的办法把共产党的军队集中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据此开始制定划界方案。

⑤ 毛泽东,《时局与边区问题》,1940年9月23日。

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① 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局势,分析蒋介石有转向日本寻求和平的可能,但这种情况不会在近期内发生。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与国民党划界(以新黄河为限),但在其他方面仍旧不打算退让。^② 殊不料,国民党毫无商量余地,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电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按《中央提示案》要求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③

由于世界大战爆发一年之后欧洲仍然没有发生革命,苏联继续坚持中立立场,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有利变化又由于蒋介石可能加入英美集团而大打折扣,毛泽东已经开始修正“孤立和打击顽固派”的策略,提出“分化与拉拢一部分可能起变化的顽固派,尖锐批评维持现状的顽固派,而坚决反对投降派与可能的贝当政府,以期实现初步的政治好转”。^④ 至10月20日前后,他断定:国民党“目前的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因而要求全党开始进入全面的防御状态,要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的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⑤

自10月19日何白皓电之后,国共关系高度紧张。毛泽东刚刚认定蒋介石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依靠英美来对付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马上又觉得不妥,因为他注意到:“美国现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目前还不可能立即打败日本。”^⑥ 而“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在[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如

① 《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227—230页。

② 《中国共产党复案》,1940年8月,中共南方局编,《国共两党谈判重要文件》,原件存重庆红岩纪念馆。

③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的皓代电》,1940年10月19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7—88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毛泽东起草),1940年10月,同上,第19页。

⑤ 《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同上,第35页。

⑥ 《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10月30日。

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做贝当的”,“故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① 但判断若蒋介石“直接准备投降”^②,共产党不仅要立即准备“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更重要的是要立即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全面战争,特别是防止“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军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边区周围封锁线是五道),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应估计日蒋夹击消灭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③ 估计到“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毛泽东联想到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过旧黄河以北必有重大阴谋。随着国民党再度通知中共中央,山东及华中的中共军队必须在11月20日之前全部开至华北,苏联大使通报国民党正在与德国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中共中央更深感事态严重。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④ 毛泽东先后致电各地党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提供看法,而中心问题就是军事上是“坐以待毙”,还是制敌机先,即“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以此来“避免严重的日蒋夹击”。^⑤ 毛泽东当然倾向于采取进攻的办法,但他深知,这一着将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不利,故又难下决心。

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时确象毛泽东所说,“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从资产阶级政权中

① 《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致周恩来、德怀、胡服、项英电》,1940年10月29日。

② 《中央书记处关于加紧准备对付蒋介石的严重进攻给周秦何叶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

③ 同上。

④ 《毛泽东关于书记处对时局意见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

⑤ 《毛、王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策略考虑致德怀电》。

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① 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在向德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做了最坏的设想。甚至，当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大使都提出“蒋目前仍处在三角交叉点上”，还没有下投降决心^② 之后，毛泽东仍旧坚持认为：“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性小，靠德日的可能性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而英美在两年内是无能为力的，蒋是等不到两年的。”^③ 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情况下，向国民党实行军事进攻也是一种冒险，但比较被国民党数十万军队赶过黄河，“置我于日蒋夹击而中消灭之”^④，到底是危险性稍小的一种冒险。11月3日，毛泽东决心已定。他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准备示以团结姿态^⑤，并指示皖南新四军军部“答应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军事行动的时间^⑥；一方面断定蒋介石期限一到，必以大军进剿，“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⑦ 为了不致被迫“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毛泽东在取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15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⑧ 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

①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8—39页。

②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0年11月2日。

③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

④ 《毛泽东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

⑤ 《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1940年11月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83—87页。

⑥ 《毛、朱、王关于新四军北移致叶、项电》，1940年11月3日，同上，第78页。

⑦ 《毛、王关于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策略考虑致德怀电》。

⑧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①一切引弦待发。然而,这毕竟是孤注一掷的重大冒险步骤,毛泽东感到缺少获胜的把握。因此,他向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请求指示。^②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决定必须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谅解和支持,才有备而无患,并有利于在“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③爆发后长期作战。11月4日,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说明采取这一重大行动步骤的必要性。他说:“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反共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我取退让态度而彼仍坚决进攻之时,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但此举“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④

毛泽东这时并不是要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两党力量对比都还没有这样做的条件。他觉得采取这一重大步骤完全是国民党的军事威胁所逼,而他相信:“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等,未必一定会破裂两党关系。^⑤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于毛泽东的计划明显地持反对的立场。斯大林明确认为:中共“还显是太孱弱”,其“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而由

① 《中央书记处关于行动布置致周恩来同志电》,1940年11月3日。

②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

③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周恩来同志电》。

④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

⑤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周恩来同志电》。

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① 共产国际领导人明确地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方针。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无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

共产国际的指示促使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形势估计和军事对策。他开始设法通过“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的态度,来从政治上谋求缓和^②;通过改变外交策略,鼓动中美英苏联合一致,防止蒋介石加入德意日集团。^③ 中共中央也于11月7日发出正式指示,要求全党把“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来,一方面“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一方面全党动员,挽救时局危机。它开始相信:“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④ 当然,距离蒋介石要求中共军队北撤的最后时限越来越近,毛泽东对避免内战还是多少有些怀疑的^⑤,他认为国共关系“好转前途很少”。^⑥ 但随着他不断得到国民党公开联合英美的情报,他决心放弃军事进攻的计划,“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力求不爆

① 《崔可夫赴华使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5—36页。

② 《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蒋介石剿共降日致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电》,1940年1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80页。

③ 《毛泽东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恩来电》,1940年11月6日,同上,第81页。

④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指示》,1940年11月7日,第40—43页。

⑤ 在中共中央11月7日发布党内指示的当天,毛泽东却告诉周恩来说,我虽“为蒋留余地”,“但恐蒋不争气耳”。《毛泽东关于撤退桂林办事处时间问题致周电》,1940年11月7日。

⑥ 参见《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4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变化及我之对策致恩来、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3页。

发大冲突”，以便“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①

四 从失败中找到成功

在确定了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性质，并确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为革命对象之后，毛泽东以此来推断国共关系的发展趋势。但是，1940年秋天所发生的这一切复杂变化表明，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还要继续下去。在11月20日这个国民党规定的共产党军队移动的最后期限过后，毛泽东对这种前景不再表示怀疑了。他显然更加重视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认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而“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②他甚至断言，蒋介石除了“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以外，“并无其他法宝”，故“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力量比上次更强大了，蒋决不敢“撕破脸皮乱打”。^③随着收到季米特洛夫11月25日进一步强调巩固国共统一战线的来电^④，和得到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消息，毛泽东相信蒋介石无投降之可能，由此而断定“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了”。^⑤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援华，国际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尽管何应

① 《毛朱王关于军事上应取自卫的防御战致德怀电》，1940年11月13日；《泽东关于力求不爆发大冲突致周电》，1940年11月14日。

② 《毛泽东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致周恩来等电》，1940年11月21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1—102页。

③ 《毛泽东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之实质及我之方针致周恩来等电》，1940年11月30日，同上103—104页。

④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0年11月25日。

⑤ 《毛泽东关于利用日汪合流时机准备政治攻势致周叶电》，1940年11月30日。

钦、白崇禧8日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①，蒋介石9日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②，但毛泽东还是估计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③，“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④，“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⑤。虽然毛泽东认为“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下降了”，他还特别致电季米特洛夫，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⑥，可是，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使他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围，那么，当然蒋介石目前不会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他只能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⑦殊不料，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一举消灭了皖南新四军近万人，并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宣布其为“叛军”。^⑧

事变一发生，毛泽东打算“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举反攻”。^⑨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会把蒋介石的这种进攻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蒋介石“一一七”命令一经宣布，他立即怀疑蒋介石“有与我党破裂决心”，蒋这样干，“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其“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⑩进而，毛泽东认定：“蒋介石

① 《何应钦白崇禧复朱彭叶项齐代电》，1940年12月8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36页。

③ 《毛、朱、王关于目前局势致胡陈并告叶项电》，1940年12月16日。

④ 《毛、朱、王关于日汪条约签订后之形势致彭左、叶项等电》，1940年12月19日。

⑤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政策问题的报告》，1940年12月3日。

⑥ 参阅《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4日。

⑦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及其军队中各派系情况致恩来电》，1940年12月2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6—117页。

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同上，第170—172页。

⑨ 《毛、朱、王关于准备消灭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致胡陈电》，1941年1月13日，同上，第139页。

⑩ 《毛、朱、王关于我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并告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同上，第180页。

已把我们推向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因此,现在再也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①他表示:“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②他要周恩来告诉苏联大使和苏联军事总顾问:“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③

然而,在接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感到军事上的反攻缺乏必要的准备。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争取时间长些过到更有利的时机”。而更主要的是,“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④,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但“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⑤

1941年1月25日,毛泽东再度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突出强调了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

① 《毛泽东关于考虑与蒋介石根本破裂问题致德怀电》,1941年1月2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7页。

② 《毛泽东关于我们不能怕破裂致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同上,第190页。

③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致周董叶电》,1941年1月23日。

④ 《毛泽东关于考虑与蒋介石根本破裂致德怀电》,1941年1月23日。

⑤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恩来、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23日。

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① 不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时对中共的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此时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中共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特别是由于“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② 因此,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③,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因为只有夺取兰州才能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而八路军“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④

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促使毛泽东重提利用日蒋矛盾问题。毛泽东注意到日本军队仍旧在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动进攻,而蒋介石本人也尽力把皖南事变局部化,于是他说“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⑤,日蒋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国共合作还可以延长时间,共产党有必要“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⑥ 他认识到:军事上进攻的主动性“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时才能完全到我手中”。^⑦

毛泽东自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策略思想之后,即把同以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争夺实力领导地位当作共产党的重要斗争目的。皖南事变后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出现了。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提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对于以蒋介石为首

①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20日。

② 《毛泽东关于询问崔可夫公开援助事宜致周电》,1941年1月30日。

③ 《毛泽东关于处理两党关系必须坚持十二条致周电》,1941年1月30日。

④ 《毛泽东关于询问崔可夫公开援助事宜致周电》,1941年1月30日。

⑤ 《毛泽东关于处理两党关系必须坚持十二条致周电》,1941年1月30日。

⑥ 《毛泽东关于须尽量利用日蒋矛盾致陈怀同志电》,1941年2月1日。

⑦ 同上。

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那种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尽管,“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①

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针起,到1941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在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尽管,由于总体上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限制,美英苏援蒋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某些政策的不赞成,敌后战场的条件也极度恶化,这许多原因使得毛泽东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积极实行他的新策略。但是,放弃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想法,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这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1945年,当毛泽东正式决定向夺取全国政权迈进之际,他曾经这样评价过这种策略变动的意义。他说:在抗战开始阶段,我们一度试图“改造国民党,改造他的军队,改造他的政府”,那时,“我们估计国民党能改造,结果国民党未改造,我们在估计上犯了一个错误”。这种情况,直到“以后出来

^①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7—220页。

了一个‘限制异党办法’，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同志才觉悟起来了。^①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共产党人从“错误”到“觉悟”的转变，指的正是上述中共策略的转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中央党校油印件。